

灵感来自有规律的劳作

《巴黎评论》:你是一位著名作家,你的读者对你的作品是很熟悉的。那么,能否谈谈你自己都读些什么书?

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:过去这几年,我的阅读经验比较奇特。我注意到,同代人作品读得越来越少,反而越来越关注以前的作家。我读过的十九世纪作品远远多于二十世纪的作品。最近,相较于文

干净,这部分工作最叫人高兴。从那时起,每次写作的时间可能越拖越长,写初稿时的那种焦虑和紧张消失了。我想,可能我喜爱的不是写故事本身,而是重写、编辑、修正……我觉得那才是写作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。我从不知道一个故事什么时候才能写完。原以为花几个月就能写出的短篇,结果可能消耗我几年的时间。当我开始感到再不赶快煞尾,小说就会反过来控制我,这时候小说就要写完了。当我达到饱和,当我竭尽全力,当我即将承受

生活即刻沦为人间地狱。你无法想象我要接到多少电话、会多少客。大家都认识这栋房子。我的住所已经很不幸地变成了公共空间。

《巴黎评论》:这种斯巴达式的作息安排从不间断吗?

略萨:似乎没间断过,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用别的方式工作。假如坐等灵感降临,那我一本书也写不出来。对我而言,灵感来自有规律的劳作。这套按时计日的作息安排,不管是不是令人欢欣快乐,至少让我能投入工作。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于当地时间4月13日在秘鲁利马逝世,享年89岁。在中国,略萨被称为“结构现实主义大师”和“拉美文学爆炸”四主将之一,他的作品曾影响了一代中国作家。1990年秋季号的《巴黎评论》刊登了一篇对略萨的访谈,谈到了他的创作历程和阅读趣味。略萨坦言,“如果某一个作家决心把一切献给这份职业,那就要倾其所有为文学服务,而不是以文学服务于其他”。

略萨:  
文学对我而言  
是激情而非职业

学,我的时间更多花在阅读随笔和历史上。至于为什么读这些书,我倒没有仔细想过……有时是因为写作这个行当。我的写作计划联系着十九世纪:我要写一篇关于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的文章,还计划根据弗洛拉·特里斯坦的生平写一部小说。特里斯坦是个法裔秘鲁人、社会改革家,还是一位后世所说的“女性主义者”。不过可能另有原因:十来岁的时候,你觉得享受这世界的时间都在前头,无休无止,可年过五十,你就发现日子屈指可数,必须精挑细选。可能就是这个缘故,我不大读当代作家的东西。

《巴黎评论》: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工作习惯吗?你如何写作?一部小说是怎么酝酿出来的?

略萨:首先得做一场白日梦,只在头脑中反复思量某个人或某个情景。然后开始记笔记,简要写出叙事线索:某人进入场景,然后离开,他做了什么事。等动笔写小说时,我会列出故事大纲——这份大纲不需要严格遵守,等进入写作进程后再做总体调整,但有了这份大纲我才能动笔。而后我把故事连缀起来,全不费心思去思考风格的问题,只是不断地写,重写一样的场景,构想出全然矛盾的情境……

基本素材对我有帮助,帮我定下心来。但创作过程里,写这部分最难。在这个阶段,我非常慎重,往往不知道将出现什么样的结果。初稿是在焦虑状态下写出来的。一旦完成初稿,可能一切都变化了——初稿耗时长久,《世界末日之战》的初稿写了近两年。那时候,我就知道故事已经在那儿了,就埋没在被我称为“我的熔岩”的初稿底下。那真是一片混沌,但小说就在里面,埋没在一堆死气沉沉的要素、可能会去掉的冗余场景,还有那些从不同视角、通过不同角色重复多次的场景里。初稿乱作一团,只有我自己读得懂。可故事正在深处孕育着。你得把它和多余的东西剥离开,洗涤

不住时,故事就算完成了。

《巴黎评论》:你是用笔写,还是用打字机,或者交替进行?

略萨:工作起头时,我用笔写。我一般在上午工作,一天里最初几个小时,我一般在用笔写作。早晨几个小时是最有创造力的。但我从来没法这样工作两个小时以上——手会写酸。然后我把手写的东西打出来,边录入边修改;可能这就是重写的第一阶段。但我总是留下手写的几行,第二天就能从前一天结束的地方开始打字。启动打字机能制造一种特殊的动感——就像热身练习。

《巴黎评论》:海明威也用同样的办法,总是留下写了一半的句子,重新提笔时可以接上前一天的思路……

略萨:没错,他认为永远不要把头脑里的全部写下来,这样第二天开头更容易。对我来说,最难的部分总是开头。早晨你得重新搭上思路,为此难免焦虑……可如果先做点机械性的事,工作就已经开始了,机器也就转起来了。但不论如何,我会保持严格的工作日程。每天清晨到下午两点,我都待在书房里。这几个小时对我而言是神圣的。但我也不是一直奋笔疾书;有时我在修改,或做笔记,但总是在有条不紊地工作着。当然,有些日子创作顺手,有些日子很糟糕。但我每天都要工作,即使没有任何新想法,我也会花时间修改、做笔记,等等……有时我会重写已经完成的片段,哪怕只是改改标点。

周一到周六,我集中写手头的小说,星期天上午写杂志文章,短文随笔。我尽量把这类工作限定在星期天这段时间,好让它不影响一周其他时间内的小说创作。有时候,我边听古典音乐边做笔记,只要里面没有唱词。自从我的住所喧闹起来,我就开始了这种安排。早晨我一个人工作,谁也不进我的书房。甚至电话我也不接。要是不这么办,

乡愁对作家有重大意义

《巴黎评论》:你的不少作品都是旅居国外的时候完成的,这或许可以被称为自愿放逐。你曾说过,维克多·雨果也是在流亡国外时写出了《悲惨世界》,这种经历对写作助益良多。远离“现实的晕眩”或许能给重塑现实带来帮助。你会不会觉得现实让人茫然晕眩呢?

略萨:确实如此,在这个意义上,我从来没写过紧贴着我的东西。贴得太紧,就意味着无法从心所欲地写作。写作时要享有充分的自由,让你能够改造现实,变换人物,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行动,将个人要素引入叙事,引入纯粹的别出心裁的东西——这些很重要,绝对必不可少。这就是所谓的创造。假如现实就摊在眼前,对我来说,反倒成了约束。我总是要保持一点距离,时间上的距离,或者更好的是,时空都保持距离。在这个意义上,“流亡”是有益的,也由于“流亡”,我发现了写作的纪律。我发现写作是一项工作,而且通常可以说是你的责任。距离总是有用的,乡愁对于作家有重大的意义。一般来说,写作对象不在场,反而丰富了记忆。例如,《绿房子》中的秘鲁不是单纯对现实的记述,而是一个被迫离开故乡、怀着对故乡痛苦渴望的人的乡愁恋的对象。同时,我以为,距离能创造一种有用的视角。现实把事情变得复杂,让我们晕眩,而距离可以捋清现实。要搞清什么重要、什么次要,从中做出选择是很难的。唯有距离才能帮我们做判断,它廓清了本质与短暂事物之间必不可少的等级。

《巴黎评论》:有一次你提到,海明威每完成一本书,他就会感到空虚落寞,悲喜交集。你写完一本书的时候是什么感受?

略萨:完全同感。我写完一本

书时,会觉得空虚、难挨,因为这部小说早就成了我的一部分。一天接一天,我发现自己与小说之间已经剥离开了,仿佛是一个酒鬼被迫滴酒不沾。一部小说不只是一件附着物,它仿佛是生活本身,被突然从我身上撕扯下来。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治愈,那就是立即投身到其他工作里,由于我早就列出了成百上千的计划,所以这也不难。我总是立马转向新的工作,毫无间歇,我从不听凭上一本书和下一本书之间的空白点肆意深化。

《巴黎评论》:作为一个作家,你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?最大的缺陷又是什么?

略萨:我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是持之以恒:我能够极其勤奋地工作,取得原先以为自己无法企及的成果。至于最大的缺陷,我想是缺乏自信吧,这件事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。我需要用三到四年时间,才能写出一部小说——而其中大部分时间,都消磨在自我怀疑当中。时光过去了,但情况并没有改善;相反,我觉得自己越发自我批判、缺少信心。或许这就是我没变得自负起来的原因:愧疚之心太强了。但我知道,我会一直写下去,直到死亡降临那一天。写作是我的天性。我的工作是我生活的基准。我想写出更多、更好的作品。我想尝试胜过以往的更有趣、更精彩的冒险。我决不承认最好的岁月可能已经逝去了,我决不承认,哪怕证据摆在眼前。

投身文学必须毫无保留

《巴黎评论》:几年前你发表过一篇散文,你说文学是一种激情,这种激情是排他性的,要求毫无保留地牺牲一切。“第一等的任务不是生存,而是写作。”这让我想起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·佩索阿的句子,他曾说道:“航海是一种必需,生活却未必如此。”

略萨:你可以说写作是一种必需,而生活未必如此……或许应该讲讲我自己的一些事,好让大家更理解我。文学对我一直很重要,从小时候起就是这样。但即便求学时读了不少书,也写了挺多东西,我也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完全投身文学,因为那时候,专事写作对一个拉美人来说是很奢侈的事,对一个秘鲁人尤其甚。那时我还有其他目标:想从事法律工作,或者当个教授、记者。那时我接受了,虽然写作对个人是根本性的事,但我可以把

它放在不重要的位置上。但读完大学,拿着奖学金到了欧洲之后,我认识到假如今后还这么定位,那我就永远也成不了作家;唯一的办法,就是下定决心,不光把文学当成嗜好,而是当成自己的主业。直到这个时候,我才决定完全献身文学。由于那时候没法靠文学养活自己,我决定去找份工作,但条件是让我有富裕的时间来写作,而不会占用我的全部精力。换句话说,我是根据作家这个定位来谋职的。我觉得,这一次下定决心,标志着我一生的转折,从那时起,我就有了写作的力量。那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转变。这就是为什么说,文学对我而言是激情而非职业。当然,它也是一份工作,因为我以此为生。可即使写作不能糊口,我也会继续写下去。文学不只是稻粱之谋。我相信,如果某一个作家决心把一切献给这份职业,那就要倾其所有为文学服务,而不是以文学服务于其他,这一点是至为关键的。有些人志不在此,只把文学当补充或点缀,甚至一种博取声名和权力的手段。倘若是这样情况,他们在创作中将碰到阻碍,文学会反身报复,这样的人也无法自由、大胆、原创地写作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,投身文学必须毫无保留。我的情况是个奇特的例证,下决心从事文学时,我本以为我选择了一条艰难的生活道路,从没想过凭着文学可以养活自己,更别说过上富足的日子。这似乎是个奇迹,至今我也不能全然释怀。为了写作,我原本并没抛下什么根本性的东西。还记得,去欧洲之前,在秘鲁时,因为不能写作,我那时多么懊丧、多么不愉快。我结婚很早,所以不得不碰上什么工作就干什么。我曾经同时兼着七份工!实际上,我当然没法写什么东西。只有星期天、节假日能写上几笔,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跟文学无关的乏味的工作上,这让我特别沮丧。现今,每天清晨睁开眼,想到竟然能把一辈子的精力都花在给自己带来最大快乐的事情上,还可以靠它生活,而且活得还不错,我就感到惊喜不已。

《巴黎评论》:文学有没有让你成为有钱人?

略萨:没有,我不是个有钱人。假如你拿作家的收入和企业总裁的收入作比较,或者跟别的行业里那些声名显赫的人,譬如秘鲁的斗牛士或顶级运动员的收入作比较,你就会发现,文学还是个薪酬菲薄的行当。

《巴黎评论》:你为什么写作?略萨:我写作,因为我不快乐。我写作,因为它是一种对抗不快乐的方法。

(本访谈译者魏然,摘自自《巴黎评论·作家访谈4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·九久读书人,2019年5月出版。内容有删节,标题为编者所加)



《巴黎评论·作家访谈4》  
美国《巴黎评论》编辑部 编  
马鸣谦 等译  
九久读书人 | 人民文学出版社